

· 胡适著

# 丁文江传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海南出版社



传记系列丛书

胡适著

# 丁文江传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琼〕新登字(03)号

责任编辑 张新奇

丁 文 江传

胡 适著

\*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出版  
海 南 出 版 社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40,0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2次印刷

\*

ISBN7—80590·555—X/I·41

定价:5.90元

# 目 录

引言 .....	1
家世和幼年生活 .....	3
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 .....	5
他在日本一年多—计划往英国留学 .....	9
海上的救星 .....	12
在英国留学七年 (一九〇四—一九一一年) .....	14
第一次中国内地的旅行 .....	19
地质科科长—地质研究所—北大地质系 .....	23
民国初年的旅行—太行山与山西铁矿—云南与四川 .....	27
丁在君与徐霞客 .....	35
地质调查所所长 (一九一六—一九二一) .....	42
北票煤矿公司 (一九二一—二五) —《努力周报》 (一九二二—二三) .....	49
“玄学与科学”的论争 (一九二三) —附论他的宗教信仰	62

“大上海”的计划与实施 (一九二六) .....	86
回到地质学来 广西的地质调查 (一九二八)	
—西南地质调查队 (一九二九—三〇)	
—北大地质学教授 (一九三一—一九三四) .....	103
独立评论 (一九三二—三五) .....	118
苏俄的旅行 (一九三三) —最后三年的政论 .....	130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	153
附录: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傅斯年) .....	171
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 (傅斯年) .....	181

## 引 言

丁文江先生死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月五日。他死后，《独立评论》给他出了一本纪念专刊（《独立》一八八期，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出版），收了十八篇纪念文字。以后还有几位朋友写了纪念文字寄给我们，从二月到七月，又收了九篇（《独立》一八九期，一九三期，一九六期，二〇八期，二一一期）。这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里有不少传记资料。可惜傅斯年先生已宣布的三个题目——“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丁文江与苏联之试验”、“我在长沙所见”——都没有写出来。于今傅先生也成了古人了！

傅先生在他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里，曾说：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幸福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适之先生将来为他作一部传记。他若不作，我就要有点自告奋勇的意思。”

我自己在“丁在君这个人”一篇文字里，也曾说：“孟真和我都有将来作丁在君传记的野心。”

我又说：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误会的是他在民国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长文里，叙述他在淞沪总辨任内的功绩，立论最公平。（适按，孟真在第二篇长文“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里，论述这段故事更详细，见《独立》一八九期。）他那个时期的文电，现在都还保存在一个好朋友的家，将来作他传记的人必定可以有详细而公道的记载给世人看。……”

二十年很快的过去了。当时有作在君传记的野心的两个朋友，于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孟真说的不错：“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决心要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要写这篇“丁文江的传记。”

在这二十年中，传记材料很难收拾。例如上文说的关于民国十五年的文电，至今我没有见到。收藏那箱文件的好朋友居然写了一篇“丁文江传记初稿”，在五年前寄给我。可惜他始终没有利用那箱里的任何文电。他自己说，“文江之死已逾十四年，我已老得不成样子，若再蹉跎，不免辜负死友了。”这篇传稿是他追忆的一点纪录，也成了我的材料的一部分。

此外，我的材料只限我在海外能收集的在君遗著，和那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遗著也很不完全，例如在君在《努力周报》上写的文字，在天津《庸报》上写的文字，我在海外都看不到。因为材料太不完全，所以我只能写一篇简略的传记。

## 家世和幼年生活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生於民国纪元前二十三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三月二十日，当西历一八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他在《努力周报》发表文字，常用“宗淹”的笔名，那当然是表示他崇敬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他的父亲吉庵先生，是泰兴县的一个绅士。母亲单夫人，生了四个儿子，文江是第二子。大哥文涛，三弟文潮，四弟文渊。他还有不同母的弟弟三人，文澜、文浩、文治。

文涛先生有“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说：

“亡弟于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识字。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五年，毕四书五经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师奇其资性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愿闻子志”。弟即应声曰“还读我书”。师大击节，叹为宿慧。……”

在君的天资过人，他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故五岁入蒙馆就可以读书。这种经验，崔东壁曾在他的《考信附录》里说的很清楚：

“自述解语后，‘先君’即教之识字。遇门联匾额之属，必指示之；或携至药肆。即令识药题。……字义浅显者，即略为诠释。……以故，述授书时，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亦颇略解其义，不以诵读为苦。……”

崔东壁的自叙最可以给文涛先生这一段记载作注解，使我们相信“五岁就傅，寓目成诵”不是奇事，只是一个天才儿童早年先认识了许多字，后来拿着书本子，就觉得“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所以能“寓目成诵”了。

文涛先生又说：

弟就傅后，于塾中课业外，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六七岁后，即阅《纲鉴易知录》；续读《四史》、《资治通鉴》诸书，旁及宋明儒语录学案。……于古人最推崇陆宣公（贄）、史督师（可法）。又得雇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夷待访录》，王船山《读通鉴论》，爱好之，早夜讽诵不辍。……时取士犹用八股文，塾师以此为教，亡弟亦学为之。……于古文，始尝推许韩昌黎，既而……乐诵大苏纵横论辩之文。年十一，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

我详引这两段追记的话，因为在君十六岁已离家出国，他在日本时已能作政治文章，他读中国经史书，他作中国文，中国诗，都是在那十一、二年中打的根底。那根底起于他母亲单夫人的教他识字，成于他自己在私塾时期的博览自修。

单夫人是一位很贤明的慈母。文涛先生说：

“先严……诸事旁午，鲜有暇晷，涛兄弟以养以教，一以委之先慈。先慈于涛兄弟爱护周至，而起居动止，肃然一准以法：衣服有制，饮食有节，作息有定程，一钱之费，必使无妄耗。事能亲为者，毋役僮仆。即不能，偶役僮仆，亦不得有疾言厉色。……”

在君一生的许多好习惯，据他大哥说，是他母亲的家教“植其基”的。

## 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

泰兴县旧属于南通州，是江北的一个小县，丁文涛先生说那是一个“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做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是最危险的事。王荆公有“伤仲永”一篇短文，指出那个神童方仲永陷在一个不良的环境里，没有做学问的机会，结果是到了二十岁时竟是“泯然众人矣”。文涛先生说他们泰兴人“远涉数百里，已非习见，遑论异国！”丁在君能从那个狭窄的地方跑出来，十五六岁就到了日本，十八岁就到了英国，大胆的走到大世界的新学术的大路上去，——这个大转变，这个大解放，都是因为他在十五岁时，忽然遇着一位恩师，——湖南攸县的龙研仙先生。

文涛先生这样记载这一件奇缘：

“弟年十三，出就学院试。时盖《戊戌政变》后之翌年也。会攸水龙公璋以通人宰邑政，兴黉舍，倡新学。闻弟有异材远志，语先严挈弟入署，将面试之。弟……入谒，‘龙公’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弟文多所阐发，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而赴日本留学之议乃自此始。”

我细读此段，不能不指出一两个疑问。第一，在君出去“就学院试”，那是童生考秀才的考试。文涛先生没有说在君曾否取中秀才。照那时代的惯例，幼童应考，往往得到学院“提

堂”的优待，在君已能作文字，他被取作秀才，似无可疑。海外无可稽考，只好等待丁文渊先生去考定了<sup>1</sup>。第二，在君应学院考试在他十三岁时（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但他初见知县龙璋先生，似乎在两年之后<sup>2</sup>，在他十五岁时，（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因为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和朱经农先生去游南岳衡山，凭吊龙研仙先生的纪念碑，曾有诗两首，其一首说：

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

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

文涛先生此文里用了一个“会”字，就好像龙知县面试在君的事也在在君十三岁时了。我们似当依据在君自己的诗句，一一只可惜在君的诗，我们没有看见原稿，只靠朱经农“记忆所及写出来的”本子。但“十五”两字，依平仄看来，似乎不错。

我们因此推想，这位龙研仙先生（他是攸县名士龙汝霖的儿子，龙润霖的侄子。龙汝霖就是光绪五年在长沙翻刻《宋元学案》的学者。在《宋元学案》的后序里，他曾提到他的“儿子璋”。）收了在君在他门下，必定还指导他去研读那个“戊戌维新”时代的“新学”。文涛先生记载的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公的书<sup>3</sup>，都不像是那个“风气锢塞”的泰兴私塾里的读物，可能都是他的恩师龙公指示他去阅读的。内地的私塾先生教人读《纲鉴易知录》，或乾隆《御批通鉴辑览》，那是可能的。在君幼年读《资治通鉴》，又读《四史》（《史记》，两《汉

---

①丁文渊按：在君家兄并未取中秀才。

②文渊按：适之先生的考证，一点没有错。家兄想要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照当时的习惯，须要经地方官保送才可。家兄初见知县龙璋先生，就因为这个缘故，和院试无关。

书》，《三国志》），我猜想也是龙公的指示。他读宋明诸儒语录及学案，大概也是龙公指导的，他读的《宋元学案》大概是龙家新刻的长沙本。

龙研仙先生对在君一生的最大造就，是他劝丁家父兄把在君送到日本去求学。这是泰兴县破天荒的事，所以文涛先生说：“戚友多疑阻，先严不免为所动。”龙公不但用“父母官”和“恩师”的力量来劝导，还替在君设法，托湖南的胡子靖先生带他到日本去。这样的出力，才打破了家庭的阻力，才使丁老先生“举债以成其行”。

这位湖南新教育家的恩惠，是在君终身不忘的。在他死之前一个月，——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他站在衡山上烈光亭的龙研仙先生纪念碑前，他还向朱经农说起“当年如何遇见龙研仙先生，面试“通西南夷论”，如何劝他研究科学，并托胡子靖先生带他出洋”。他说，“他若不遇见龙先生，他一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能够那样早出洋留学。”（朱经农先生的纪录，见《独立评论》一八八期。）

---

③文渊按：我们家中可能因为先曾祖游宦浙江，颇藏有若干书籍。我们年少时，每年须将藏书暴晒一次，尚能记及顾、黄、王诸公文集。先曾祖馀堂公仅有子女各一人，子为先祖振园公；女则嫁六合唐府（名已记不清）其翁某为翰林，和曾文正公同时，奉命在乡主办团练。后因太平之乱，六合失守，先祖父夫妇逃到我们家中避难。先祖父就死在我们家里，她仅生有一女，因外祖母钟爱（即先曾祖母），从小就留居外家，至出嫁时，才回其父家。我们这位表姑母，我们从小称她为“寅姑妈”，她的大名，我从来没有知道。她和苏州名进士曹叔彦先生结婚以后，她们夫妇起初每年都来我家一次，拜见外祖母，以后也往来不绝。我这位表姑父尝治《孝经》（我们家中也藏有此书），虽未做官，然而对清室极忠，终身做遗老，不肯剪辮子。我在一九三五年，到苏州的时候，还拜见过他老人家。他对家兄们的读书，似有影响，因为先母的遗志，本来是要在

君家兄去苏州，从叔彦先生攻读。先母去世时，在君家兄十四岁。

## 他在日本一年多——计划往英国留学

在君跟胡子靖先生到日本留学，大概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那时他十六岁。他在日本住了一年半左右，从他十六岁到他十八岁，从光绪二十八年的下半年，到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的三月。

他在日本的生活，只有李祖鸿（毅士）先生和汤中（爱理）先生的追忆（《独立评论》第二〇八期，第二一一期），可惜都不详细。汤中先生说：

当时在君只有十八岁，和我同住在神田区的一个下宿屋，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一九〇四年前后，出了好几种杂志，……如……浙江留学生之有《浙江潮》，江苏留学生之有《江苏》。……《江苏》杂志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惕生（永建）先生，第二次是汪袁甫（荣宝）先生，后来就轮到在君担任。

在君的文章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排满革命）。可惜在君在《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现在都散失了，我搜访了多时，一篇也没有找到。……

“在君住在下宿屋，同我天天见面，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兴（原文误作“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少‘他

的奇怪的眼光，他那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而已。……”

在君在日本一年半，虽然认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虽然参加了当时东京留学界“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但没有进什么正式学校。不久，日俄战争发生了，——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夜东乡大将袭击旅顺口，——大家更无心读书了。在那个时期，和李祖鸿兄弟同住的庄文亚先生常常接到吴稚晖（敬恒）先生从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寄来的信，信上常说，“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也常说苏格兰生活的便宜，常劝人去留学。据吴先生的估计，中国留学生到那里留学，一年只要有五六百元就够用了。

李祖鸿先生说：

“在君受了这种引诱，便动了到英国去留学的意思。……庄文亚君也在这时候起意要到英国，他和在君一旦遇见，彼此一谈，志同道合。……在君搬到我们那里来住了，他们时常商谈出洋事，自然也冲动了我去英国的念头。……后来是在君出主意，由他先资助我路费，且同我出去，到上船以后，再报告家中，商量以后的学费。……”

李先生继续说：

“我们三人决定出洋以后，预备了大约一两个月的英语。在君的英语是一点根基都没有，比庄文亚和我都差。然而到我们出发的时候，一切买船票等等交涉，都是他出头了。……”

“我们离开东京是在光绪三十年，时间大概是春夏之交。（汤中先生说是“三月某日”。）我们那时所谓经济的准备，说来也甚可笑。在君的家中答应给他一千元左右，交

他带去。至于以后的接济，却毫无把握。庄文亚家的资助不过四五百元，以后却再无法想了。那时正值我家把我和我弟祖植半年的学费三百元寄到，我们就向家兄祖虞商量，先把此款归我带去。总算起来，统共不过一千七八百元。

“依我们当时的计算，日本邮船价廉，……我们到英国时至少还可以有好几百元的余款。不料那时适因日俄战争，日本船不能乘，於是改乘德国船，三等舱位的船价每人三百元左右。……我们在上海又须得耽搁一阵，因为丁庄二君的家款都约定在上海交付。……到我们（在上海）上船赴英国的时候，我们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多个金镑！……”

三个青年人身边只有十几个金镑，就大胆的上船，开始他们万里求学的冒险旅程了！

## 海上的救星

这三个大胆的青年，一路上“仍是花钱游玩，并不着急。”有一天，在君在船上听人说，爱丁堡距离伦敦还很远，每人火车费要多少钱。他们估计手里的钱已不够买车票去会见吴稚晖先生了。他们这时候才着急起来了。

他们船上头等舱里有位姓方的福建客人，常常找他们三个人谈话。船到了新加坡，方先生约他们一同上岸去看林文庆先生。林文庆先生请他们吃饭，谈起康有为先生现住槟榔屿，船经过时，他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

到了槟榔屿，他们去拜访康有为先生。康有为先生见了他们，问了各人的情况，颇表示关切的意思，临别时送了他们十个金镑，还托他们带一封信到伦敦给他的女婿罗昌先生。后来罗昌先生收到他丈人的信之后，也寄了二十镑钱给他们。李祖鸿先生说：“康南海的赠金救济了我们途中的危险。……罗昌君的二十镑支持了我们不少的日子。……至於所赠的三十镑，我听见在君说，于南海先生逝世之前，他曾偿还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

他们到了伦敦，当夜赶火车北去，到爱丁堡见着吴稚晖先生，吴先生已给他们预备了住所。他们把他们的志愿和经济实况告诉了吴先生，吴先生替他们计划：他自己同庄文亚到利物浦（Liverpool）去过最刻苦的生活，因为庄家没有钱再接济他了。丁李两人仍留在爱丁堡学习英文，因为他们两家也许还可以勉强筹点钱寄给他们。在三十多年后，祖鸿先生说：